

歲月留痕

院藏石刻文字拓本定年舉例

王競雄

先民取之大自然，在石材上書刻文字，為時相當久遠。以考古出土的實物來看，殷商已然出現少數實例，春秋戰國時代的守丘刻石、石鼓，均為世人耳熟能詳的例子。及至秦漢，石材的經濟效益獲得重視，用途日漸擴展，石刻文字的面貌也隨之豐富起來，從個人功德記事、宗廟儀文到經書彙刻等等，石刻行於莊嚴典重的場合，有時為歷史證言，直接或間接擔負起傳緒文化的任務。石刻天然無華，近似金屬般不朽的特質，且與人們追求永恆的意念相契合。銘記於「金石」，以傳之久遠，成為時人共有的認知。此後歷代書刻不絕，時或賦予新的內涵，石刻文字的領域也就永遠探索不盡。

將石刻文字傳拓在紙上，以便於保存和流傳，是後來纔有的構想。人們留意到原石雖然堅固，也不免因人為因素或不可抗力的變故，殘損不全甚至歸於零，拓本或多或少彌補這個缺憾，以柔代剛，達到延續的目的。唐寶胤《述書賦·上》（書成於天寶年間）有云：「石雖貞而云泐，紙可寄而保傳」，當是有所感而發，寄望於拓本及時存真，留住石刻文字某一階段的面貌。拓本之於原石基本上主從分明，石刻的意義和功用，也往往經由拓本的流佈，得到進一步發揮。唐人既已感受到拓本的重要，拓本的源起是否就在此時，或者為時較早，歷來各家看法並不一致。曹之先生歸納前人的見解，求證於文獻史料，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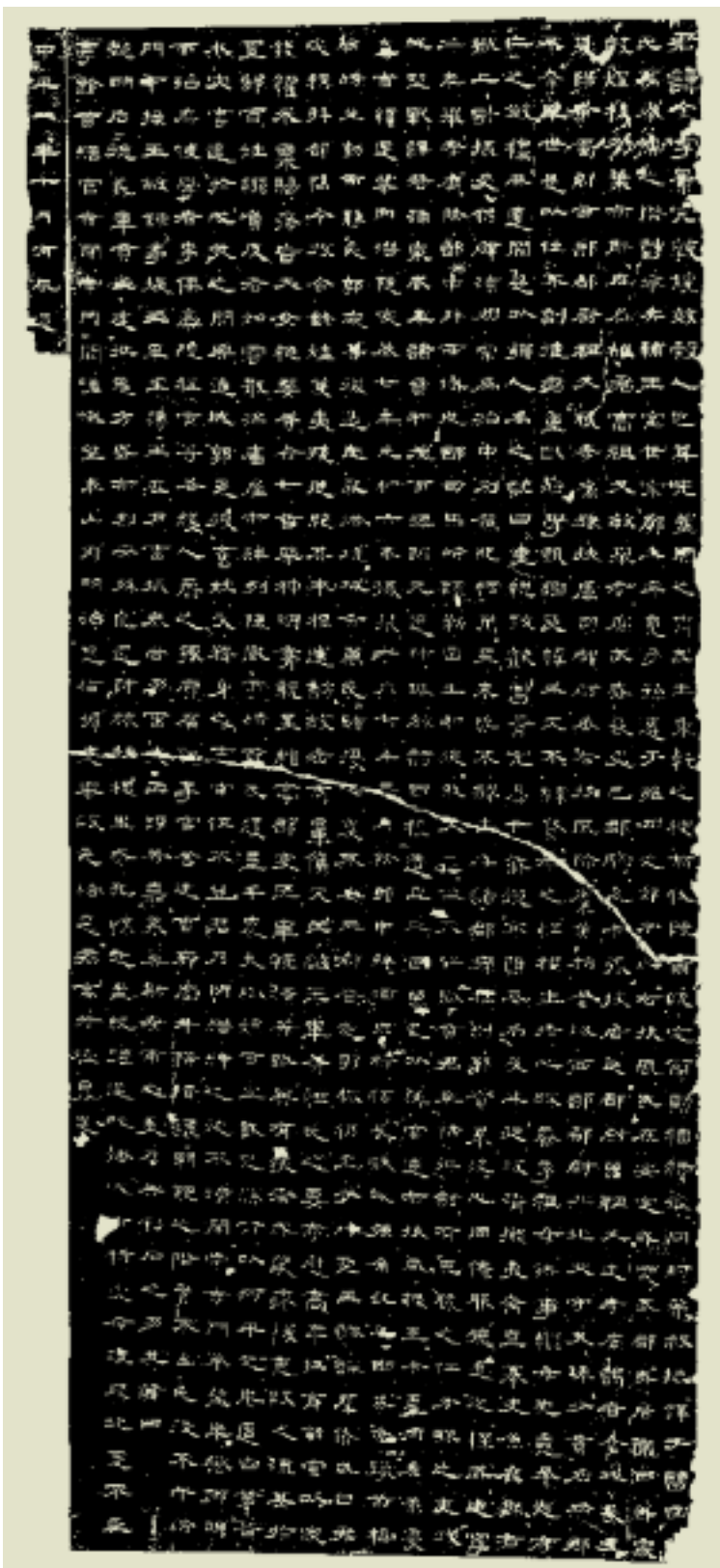
《拓本探源》一文中，舉證南北朝時代尚無拓本產生，以為拓本「最早出現在唐代。」其說或與實情相去不遠，因為晚近敦煌發現的寫卷，從紙質和書寫的狀況，可以證實西晉以後紙張的應用已見普及；此外和寫卷同時發現的墨拓本，如《化度寺碑》、《溫泉銘》，雖然或有殘缺，業經學者考訂為唐拓本。拓本出現較晚，除了紙張供需的因素之外，傳拓技術的開發也是關鍵之一。石刻既為立體的表現形式，如何運用硃、墨或其他顏料作媒材，將石刻文字的內容和書法，過渡到平面紙張上表現出來。這套工序環環相扣，需要不斷地摸索嘗試，方能達到周密圓滿的境地。

上述唐拓本的狀況，據施安昌先

生目驗原件，推測可能使用毛氈作工具，在石面附著拓紙之後，捲曲毛氈濡墨，斜向擦抹而成。如此「擦拓」出來的成品，傳拓技術未盡合於理想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人們初試紙張傳拓時，或可能同時考慮過其他媒材的效果，諸如模仿封泥嘗試黏土材質，或者試驗絹帛等材料，目前已經不得

而知。選擇紙張之所以合用，除了經濟、輕便之外，紙與硃墨色料兩者相容，傳拓後書法的「表現」也獨具特色。石刻文字多數陰刻，間或陽刻但是畢竟少數。陰刻經傳拓後點畫「反白」，而反白以外的區間，無論硃拓、墨拓，時在濃淡斑駁中隱隱透出石質紋理。通常筆寫墨蹟，自然透露

墨色濃淡的變化，拓本卻見點畫結構反白，得用心去感受筆端抑揚頓挫起止的韻律。此種「含藏」，從某一角度看隔了一層，不若墨蹟直接顯現毛筆律動的筆蹤。啓功先生於此別有看法，提出「透過刀鋒看筆鋒」，掌握上石前行筆的律動，來領會石刻文字書刻結合的美感。



圖一 郃陽令曹全碑 墨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同的效果。入宋以後，人們泛用「拓本」一詞，或者指稱「打本」，有時也與影寫摹搨混同使用，乃至於「拓」、「搨」漸有殊途同歸的趨勢。沿用至今，「拓本」已成為大家常用的傳拓語詞。

石刻文字經由拓本得以化身千百，不同階段的拓本，若前後排比，有助於追蹤原石走過的歲月歷程。原石的情況，細微處如點畫模糊、損泐，以至於「石花」點點，石面破綻出現裂痕，甚至於石體缺損、石身斷開種種嚴重狀況，拓本如實顯現出來。往往全張拓本又較剪裱本的存真度為高，石刻整體的影象，包括題額、文字內容、陰陽面和側面、雕飾、形制各個組成，其中細節或有文字記載所未能到，而全張拓本能逐一反映出來。拓本可說是原石的紀錄照片，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，探尋拓本傳拓的早晚，當屬面對石刻文字的基本課題。以下就此基本課題，以院藏東漢〈郃陽令曹全碑〉全張拓本（以下簡稱院藏本）為例，（圖一）試在時光的軸線上定出傳拓的時段。石刻文字

的傳拓，原則上碑陽、碑陰分拓，世人不免偏重碑陽，時或略去碑陰不拓，以致於流傳拓本以碑陽為多。院藏本也未見例外止於碑陽，是否碑陽、碑陰分途流傳已未可知。

〈郃陽令曹全碑〉（以下簡稱〈曹全碑〉）的流傳，早先一片空白，明神宗萬曆初年，原石於陝西郃陽縣（今合陽縣）莘里村出土時，碑額已然佚失。碑身高二七二公分、寬九五公分，碑陽二十行，滿行四十五字，末行闕開少許距離，單獨書刻立碑年月日；碑陰由上而下共計五列，刻記出資立碑者五十七人。碑石立於東漢中平二年（一八五），由門下掾王敞等人主其事。碑文中追述曹全系出右扶風隴褒侯相曹鳳之後，為人敦厚孝友，從基層上計吏做起，而後參與地方事務，歷任西域戍部司馬、右扶風槐里令、酒泉祿福長，以至於郃陽縣令。對於曹全先後應變疏勒王亂事以及黃巾動亂，安定百姓生活，頗多頌揚。其性質接近「去思碑」，為地方成員感念長官之作。碑石出土後先行就地安置，繼又遷移孔廟安頓，其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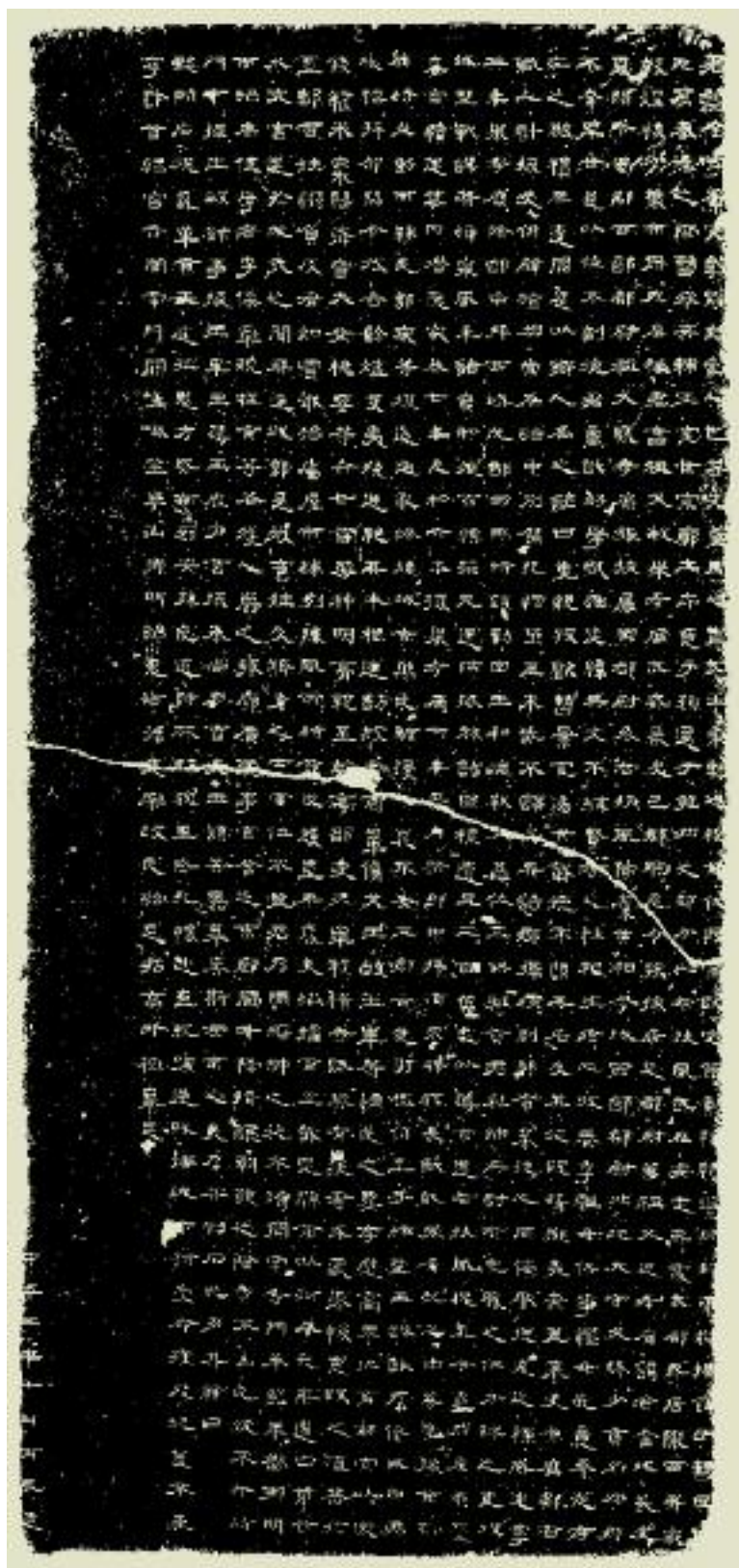
碑石產生裂痕，從第一行「商」字延伸到第十九行「吏」字。一九五六年，碑石遷移西安碑林保存，未料遷移過程中第十二行「老」字和第十三行「離」字意外受損，（圖二）由是拓本傳拓的早晚可以出現裂痕、遷移碑林作階段劃分，區分為「未斷本」、「斷後本」、「碑林損本」三個階段，斷痕的有無以及「老」、「離」二字是否完好，便成為分野的主要標記。

傳世〈曹全碑〉拓本，其中少數為「未斷本」，包括著名的張銓藏本、王弘撰藏本，其可寶重不待多言。歷來將「未斷本」定為明拓，除了拓本上明末收藏家的題跋、印記可為根據之外，文獻中碑石的相關記載，也是重要的佐證。目前尚存的《重修郃陽縣志》，係萬曆十一年郃陽縣丞葉夢熊（一五三二—一五九七）重行撰修，其第五卷記載碑石出土，並且錄下碑陽正文，雖然未錄及碑陰，已為碑石出土留下實錄。萬曆四十六年（一六一八）趙樞刊行《石墨鐫華》，對碑文進行初步考證，贊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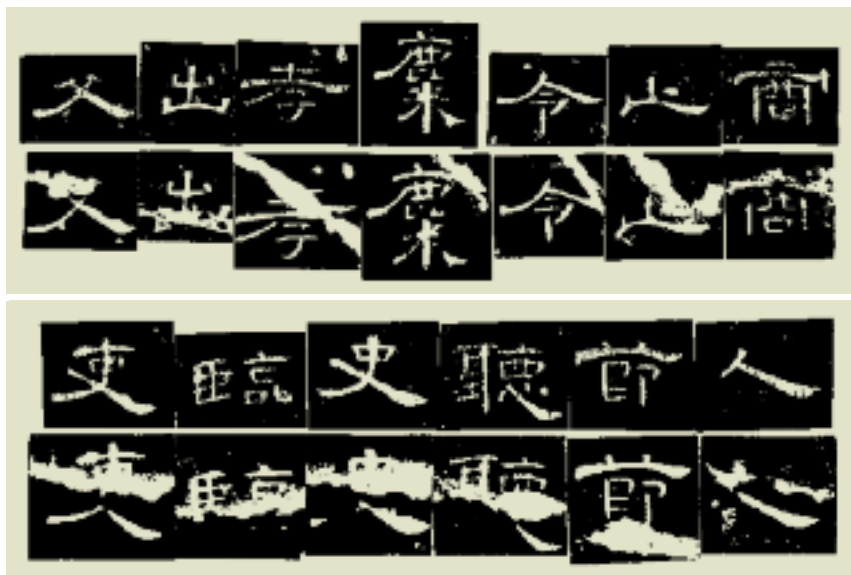
唐人「擦拓」未臻理想，是早期無可避免的現象。後人頻頻贊賞宋拓本拓工精好，拓紙沒有浮脫的毛病，拓墨勻細，字口清晰。足見傳拓技術通過長久的歷練，終於漸入佳境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唐人有其慣用的傳拓語彙，如寶蒙注《述書賦·上》文云：「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，石既尋

毀，其本最稀」，文中「打本」即是指稱拓本。又如天寶四年（七四五）〈石臺孝經〉刻成後，李齊古上表奉聞：「謹打石臺孝經本，分為上下兩卷，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」，文中「打」字，不難意會便是傳拓的意思。據清王昶（一七二五—一八〇六）的考訂：「打本是中唐人語，前此未

見」，由於「打」的本義有「捶擊」的意思，可以推知唐人傳拓方法不止於「擦拓」一種。既以「打本」相稱，可能關連傳拓時撲墨的動作，手肘連續起落叮咚有聲，字字「捶擊」出來的成品與筆寫不同。「擦」、「打」操作有別，後者起落碑石的方向接近垂直，可以斟酌需求，達到不



圖二 郃陽令曹全碑 墨拓本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引自《陝西碑石精華》



圖四 裂痕波及字目前後對照

朱氏跋中記石斷於壬子年，也就是康熙十一年（一六七二），其說或可取信，如葉程義、蔣文光兩位先生，均認同碑斷於是年。此外別有採納志書的記載，為時較早，謂明末風災導致碑石裂損。起初裂痕較淺，而後延伸



圖三 「因」字未損（右） 上海博物館藏 引自《法書至尊》
「因」字損缺（左）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引自《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·五》

連帶波及碑文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行「商」、「止」、「令」、「麋」、「孝」五字；第七、八行「出」、「父」二字；第十一、十四行「人」、「節」二字；第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行「聽」、「史」、「臨」、「吏」四字。現以前述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未斷本，對照西安碑林博物館藏饒士端籤題斷後本列表，（圖四）以見裂痕波及字目的情況。院藏本裂痕延伸的狀況與上述相同，但是「老」、「離」二字完好，當歸屬為第二階段「斷後本」。相對於「未斷本」而言，「斷後本」的流傳居多數，除了斷痕為彼此共通現象，或多或少波及上述十三字之外，又續增若干字目損泐，狀況視傳拓的早晚略有差異。據王壯弘（一九三二—二〇〇八）《增補校碑隨筆》所記，碑石在明末清初經人清理後，第十一行「日」字，因此剔成「白」字形，此後的拓本可以此為記。王氏歸納多年目驗拓本的心得，指出康熙年間第九行「悉」字下半損泐；乾隆年間續



圖五-1 饒士端籤題本 引自《西安碑林名碑》



圖五-2 于本



圖五-3 院藏本

見第一行「乾」字左半損泐，其狀穿連有若「車」字；嘉道之際又見第六行「學」字末端損泐，彎轉處如綴小珠；咸同之際再見第十行「月」字末兩筆損泐；光緒以後第二行「遷」字亦見損泐。如此歲月留痕，損泐與時俱增，流傳今日的「斷後本」，若為斷後未久傳拓，如前述饒士端籤題本，尚見「悉」、「乾」、「學」、「月」、「遷」諸字完好；（圖五-1）倘若傳拓已晚，上述六字均見損泐，

書法：「道古不減卒史、韓勅等碑，且完好無一字缺壞，真可寶也」，因此知際趙爾所見拓本，尚屬字字完好。其後碑文第一行末尾「因」字破損，拓本乃見字目損缺，未斷本遂有「因」字未損和缺損的分別。現今上海博物館所藏沈樹鏞舊藏本，「因」字尚見完好；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未斷本，「因」字已見損缺，兩者皆已剪裝成冊，（圖三）均可見碑文較早的面貌。陶喻之先生在《初拓曹全碑因字不損本疏舉銓鏡》一文中，檢視未斷本，對所見「因」字未損拓本加以銓鏡考實，有助於深入了解各本來龍去脈，本文不再贅言。
〈曹全碑〉出現裂痕，清人文集中不乏相關記載。其時朱彝尊（一六二九—一七〇九）愛其風神飄逸，多方面收集拓本臨寫不輟，所著《曝書亭集》收有一段跋語，全為感慨碑石裂痕而發：
右予庚戌冬跋尾，越二年再至京師，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，石已中斷，完好者且漶漫矣，更歷數十年，必又歎此碑為難得。



圖七 于本(右)與院藏本(左)咸、等、揖三字對照

張廷濟究心古文篆隸，家藏數本《曹全碑》，其目驗「乾」字填墨，當非偶然。論及碑文書法時，以為：「漢碑筆法每刻不同，雄厚瘦逸，正正奇奇，斷不得以一格繩取」，心中似與漢隸有宿契，能以持平的態度兼容並美。類此目驗填墨的記載不止一見，如梁章鉅（二七七五—一八四九）《退庵金石書畫跋》亦云：「又在他

未損為舊本，不復奢求未斷本。於是售者保留斷痕，略將「乾」字填墨少許，使損穿相連的部位「回歸」本來，彷彿「乾字未穿本」，滿足人心對舊本的需求。以下引錄張廷濟（一七六八—一八四八）《清儀閣金石題識》道光十二年一段跋語，略見彼時拓本「乾」字填墨的實情：

曹景完碑足本，碑文八百四十九字，陰四百四十一字，損去四字。乾隆四十八年癸卯，余年十六，同堂里朱家濱葛杖坡五兄雄圖所貽之本，乾字左二直畫已鑿通，售者以墨暈斷，偽為未通之舊本，然至今已五十年，今時所拓又不得到此矣。

或者立足文字、聲韻、訓詁的觀點，今日學界論述頗多，在此不一一列舉。碑文字徑較小，風神秀逸俯仰有度，臨習者為之傾心不已，如鄭鼐（二六二二—一六九三）、朱彝尊等人均善於詮釋筆法，得到書壇的認可，彼時各界訪求拓本可以想見。然而碑石出現斷痕後，或有用墨填補裂痕出

處見曝書亭此碑藏本，則乾字穿畫係描斷，覃溪師亦未之知也。」張、梁的經驗適可借為解答，說明院藏本「乾」字未見損穿出於人為，定年仍應以損至「遷」字為準，其傳拓上限與于本相同，當在光緒元年以後。

通過以上拓本的比對，並結合參證文獻著錄，院藏本傳拓上限的指標得到定位。若再比較其他字目損泐的情形，有助於進一步認知拓本傳拓的早晚。如第十一行「咸」字，兩者口上短橫畫均呈現「」形，相同情況亦見於第三階段「碑林損本」，而未斷本卻不然。據魏小虎先生《曹全碑咸字考略》文中分析，推測光緒前後可能「二次剔碑」，以致於清後期拓本「咸」字類多如此。再如第十二行「王畢等」、第十六行「升降揖讓」，其中「等」、「揖」二字，院藏本點畫損泐較多，（圖七）顯示傳拓猶在于本之後。至於院藏本傳拓下限的設定，當以「老」、「離」二字完好為據，不晚於第三階段「碑林損本」，即在一九五六年以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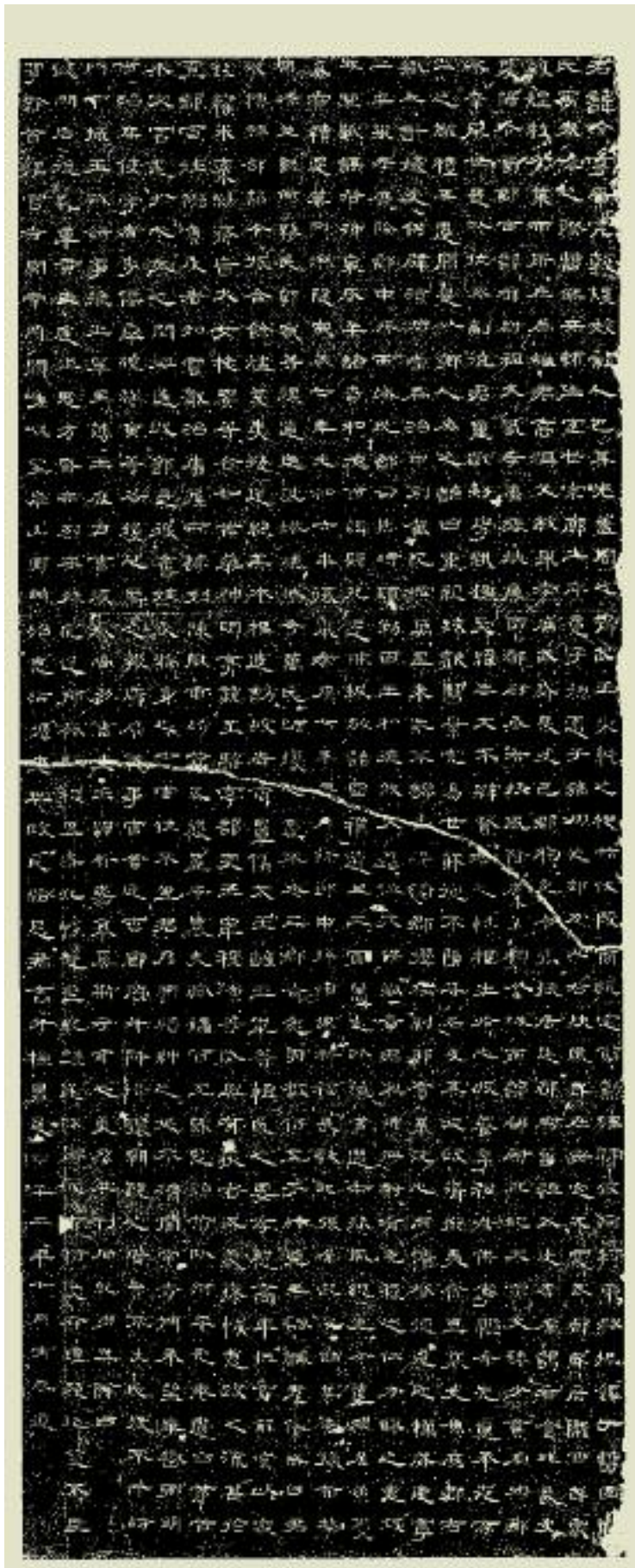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其定年上限須以損至「遷」字為準，不能早於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），例如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拓（原係于右任舊藏，以下簡稱于本），六字俱見損泐。（圖六）院藏本的情況和于本頗為相近，對照上述六字列表，比較點畫間泐損的細節，惟獨「乾」字未損，（圖五-2,3）若同樣比照定

年，必須先行探究「乾」字不合損泐次第的原因。

《曹全碑》正文八百四十九字，出土後點畫猶見完好，自然成為愛好金石者關注的重點。其時考證學風漸盛，各家貢獻所學探究碑文，排除一度對碑石真偽產生的疑惑。探索日久心得累積，或者從歷史的角度出發，

或者立足文字、聲韻、訓詁的觀點，今日學界論述頗多，在此不一一列舉。碑文字徑較小，風神秀逸俯仰有度，臨習者為之傾心不已，如鄭鼐（二六二二—一六九三）、朱彝尊等人均善於詮釋筆法，得到書壇的認可，彼時各界訪求拓本可以想見。然而碑石出現斷痕後，或有用墨填補裂痕出



圖六 郃陽令曹全碑 墨拓本 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藏 引自《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于右任舊藏金石拓片精選》